

# 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 必修課系列

王川柯

錢學森先生在晚年曾經對前來看望的溫家寶總理發出如下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中國科技大學前任校長朱清時教授則具體指出：民國那樣的動亂時期，對教育干預最少，大學就能找出最好的路發展<sup>①</sup>。

我們希望，一場認真的反思，可以從此開始。作為一個大學教師，筆者期望在這場反思當中，大家能通過考慮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系列的時機和路徑，來反思大學辦學自主權的大問題。

錢學森的「世紀之問」，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對於中國現行教育制度的不滿和期望。作為大學教師，筆者期望在這場反思當中，大家能通過考慮主義思想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系列的時機和路徑，來反思大學辦學自主權的大問題。

## 一 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的「世紀之問」，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對於中國現行教育制度的不滿和期望。2010年，溫家寶在中南海先後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就〈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俗稱「新教改方案」）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這也值得稱許。

據當時的報導，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2月7日表示，上述綱要文本會在春節過後、兩會之前向社會公示，「讓社會公眾了解規劃綱要中提出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思想與政策『是否合適』」<sup>②</sup>。筆者曾經懷疑這個報導是否準確，因為公示的宗旨，不應該停留在只是讓人「了解」這樣一個層次。

後來的公示，卻說明上述報導並沒有怎麼曲解部長的發言，因為部長的意思，只不過仍然是教育部一以貫之立場的體現，那就是討論的範圍並不擴大到要害問題，座談人員並不擴大到他們認為可能突破這個範圍的學者。

事實上，在部長的上述「表示」以前，朱清時教授就連續發表談話，對於錢老的世紀之問，表達了真正逼近實質的思考。他指出，「民國時期，社會動亂，內戰，各派政治勢力在進行鬥爭，這個是毫無疑問的；民國時期動亂，我們誰

都不想要，但是為甚麼這種時候培養出這麼多大師級人才，又為甚麼民國時期動亂結束，隨後60年我們變成沒有大師的時代了？」他發現，「這件事正好說明了教育的規律，就是在民國那樣的動亂時期，對教育干預是最少，大學能夠按照自己的規律去走自身發展的路，……沒有人干預它，就能找出最好的路發展。而我們過去這60年來最大的教訓就是我們在管理體制上沒有理清，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麵團，失去了生命力。」<sup>③</sup>

在「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麵團」的情況下，朱清時算得上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大學校長了，面對一元化的「堅強領導」要求大幅度擴招的巨大壓力，能夠頂住不為所動的，以筆者有限的視野，似乎也只有他一人。他說民國時期對教育的干預最小，說我們的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麵團」，實在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誰在「任意揉搓」教育這個「麵團」？主要就是教育部。當然，還有他們上面的推手。

## 二 代際比較

讓我們從前兩年對內地大學影響很大的一件事情說起，那就是教育部布置的所謂「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資中筠先生2008年4月25日在《中華讀書報》發表文章〈大學「評估」弊大於利〉，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為了應付檢查和評估，許多大學都是從上而下大規模造假，形成「造假風潮」。幾年前的試卷，重新挖出來加工潤色；歷史上的缺項，乾脆「仿古創造」。本來，因為評估專家多也是在別的大學裏面工作的人，很難看不出造假的痕迹，可是因為「和諧第一」、「穩定壓倒一切」，再加上「紅包」潤滑，結果你好我好，造假的和看假的雙方都心照不宣，默契到預定的「結論」上來，活脫脫是一齣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的現代版。這首先是進一步褻瀆大學精神，讓學術殿堂更加斯文掃地，還把廣大教師累得個半死，再就是硬生生創造一個很大的腐敗空間。這是教育部「任意揉搓」教育這個「麵團」的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當時，大學流傳着一則諧音格謎語，謎面是「本科教學評估」，謎底是「洲際導彈（周濟搗蛋）」。按筆者的觀察，在聽到上面這則謎語的時候，幾乎所有教師都會發出會心的苦笑，多數院校領導也會發出無奈的苦笑，沒有甚麼人願意為時任教育部部長的周濟鳴不平。可見這種「本科教學評估」在我們的大學如何不得人心。可是，在一竿子垂直捅到底的一元化堅強領導體制之下，不管它多麼不合理，不管它多麼不符合大學精神，不管它多麼不得人心，下面卻不得不恭恭敬敬照着做。在出家人也有科級、處級之分的制度環境裏面，廣西師範大學七八位校長、副校長、書記、副書記卻兩行一字排開，鮮花簇擁教育部借來參與評估事務工作的一位女秘書，遂成為教育部威嚴的一個標記。

讀宗璞2007年9月12日發表在《中華讀書報》的文章〈漫記西南聯大和馮友蘭先生〉，讓我們知道民國時期也有類似的事情，不過程度比較輕，執行力更弱。話說1942年6月，民國教育部三度「訓令」西南聯大務必遵守教育部核定的應設課程，以統一全國院校教材。聯大教務會議議決，由馮友蘭先生執筆，予以駁

在「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麵團」的情況下，朱清時算得上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大學校長了，面對一元化的「堅強領導」要求大幅度擴招的巨大壓力，能夠頂住不為所動的，以筆者有限的視野，似乎也只有他一人。

斥，提出「准此以往則大學將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夫大學為最高學府，……豈可刻板文章，勒令從同。……即同一課程，各大學所授之內容亦未有一成不變者。惟其如此，所以能推陳出新，而學術乃可日臻進步也」。「教育部為政府機關，當局時有進退；大學百年樹人，政策設施宜常不宜變。若大學內部甚至一課程之興廢亦須聽命教部，則必將受部中當局進退之影響，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進行，肅學生之視聽，而堅其心志……」④面對西南聯大的抗爭，民國教育部「三度訓令」的事情，得以不了了之。

這在我們現時一元化的堅強領導之下，做得到嗎？兩相比較，這些年我們的大學，真是「直等於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啊！對教育的干預那麼厲害，讓我們的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麵團」，錢學森指望的大學，也就遙遙無期了。

### 三 尷尬的課程設置

錢老的世紀之問和溫總理的五次座談，引發許多議論。在此，筆者也貢獻一點意見，那就是請大家首先考慮「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所有專業必修課系列的時機和路徑。

六十年以來，主義思想類課程都是大學所有專業的必修課，實在是誤人子弟。有人指出，民國時期，只一所清華大學，就在短短二十年裏培養出王淦昌、聞一多、錢鍾書、曹禺、潘光旦、夏鼐、華羅庚、吳有訓、費孝通、錢偉長、梁思成、季羨林、陳省身、吳晗、王力、錢三強、王大珩、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朱光亞等一眾大師。其時，北京大學等其他一些大學也是群星璀璨。這裏面可以說的很多，但是他們求學的時候並沒有把時間花費在現在這種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上，想必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錢學森去世以後，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把他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醫院召集他們的談話整理出來發表，題為〈錢學森最後一次系統談話：大學要有創新精神〉⑤。錢老談到，「沒有創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秀學生。」可是現在，「死記硬背」是這些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教學的常態，因為學生根本不相信這些蒼白的說教，但為了通過考試、取得學分，卻不得不死記硬背許多他們完全不相信的東西。

錢老推崇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教育，他在上述這個談話中花了許多時間回顧自己在加州理工學院深造的體驗。他說：「我本來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師鼓勵我學習各種有用的知識。我到物理系去聽課，……化學系的課我也去聽，……參加化學系的學術討論會。」他還談到「老師馮·卡門聽說我懂得繪畫、音樂、攝影這些方面的學問很高興」，談到自己從小「讀過許多藝術理論方面的書，像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這些藝術上的修養不僅加深了我對藝術作品中那些詩情畫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學會了藝術上大跨度的宏觀形象思維。我認為，這些東西對啟迪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創新是很重要的。科學

民國時期，只一所清華大學，就在短短二十年時間裏培養出王淦昌、錢鍾書等一眾大師。這裏面可以說的很多，但是他們求學的時候並沒有把時間花費在現在這種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上，想必也是重要原因。

上的創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新的思想往往開始於形象思維，從大跨度的聯想中得到啟迪，然後再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

你看，晚年的錢老，在「本專業」航空以外，談了物理、化學、繪畫、音樂、攝影，還談了普列漢諾夫 (Georgii V. Plekhanov) 的《藝術論》，恰好就是不談主義思想理論對他有甚麼幫助。這不是很發人深省嗎？

## 四 化解禁錮

也許有人會說，民國時代的學子只是「沒有條件」必修這些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罷了，如果他們能夠必修這些「放諸四海而皆準」和「戰無不勝」的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說不定會取得更大的成就。邏輯上這樣痴想，固然可以，但是我們要問，誰能夠請來一位比較接近大師水平的學者，願意告訴大家，學了這種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對於其學術成就乃至處事為人真的有任何幫助呢？

相反例子則很多。例如前面提到的一眾大師，沒有一位是因為學習了這些主義思想理論而成就為大師的。相反，他們當中的幾位，因為後來宗奉了這些主義思想理論，反而窒息了創造力，不再有足以傳世的作品，更不用說其中還有因為被主義思想理論整肅而自歿的了。這就是歷史的事實。

他們當中的陳寅恪先生，更是明確提出，不奉行上面要求拿來作為指導思想的主義：據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20年》，當陳先生被邀請北上就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所長的時候，陳先生提出擔任所長的主要條件，就是「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sup>⑥</sup>。

說實在，這些課程的主要功能，就是設立思想禁區：應該這樣想，不應該那樣想，這個要奉行，那個不能碰。所謂把它們「灌輸」下來作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也。廣大學子的創造力，就這樣被禁錮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就這樣被窒息了。為甚麼平均來說，我們的學生不像發達國家的學生那麼意氣風發才智飛揚，我們的人民不像發達國家的人民那樣自在自強體面尊嚴？意識形態禁區的存在和長期禁錮，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閱讀陳志武教授的著作《為甚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筆者的體會是，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概而言之是因為我們的「制度成本」太高。如果說其他部門或者行業的這種制度成本分析起來比較複雜的話，大學教育和學術創造的制度成本的一個重要組成倒是比較清楚的，就是以主義思想類理論為代表的意識形態禁區的禁錮，以及長期在這種禁錮之下學習和工作造成的人性扭曲和創造力損傷。

因為一直在大學工作，筆者知道許多大學一直把學生一天中精神最好的時間，安排來上主義思想類課程，這實在非常非常浪費。所以，請大家認真考慮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的時機和路徑。當然，這不等於說這類課程不可以講，只是說不要作為所有大學所有學生的必修課。蔡元培的辦學思想，是「對於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並包」<sup>⑦</sup>。對於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我們也應該持「兼容並包」但是「不強加於人」的態度。

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的主要功能，就是設立思想禁區。為甚麼平均來說，我們的學生不像發達國家的學生那麼意氣風發才智飛揚，我們的人民不像發達國家的人民那樣自在自強體面尊嚴？意識形態禁區的存在和長期禁錮，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 五 人同此心

改革講究先易後難。筆者提出考慮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系列的時機和路徑，除了其好處很多以外，還因為容易達成共識，並且實施成本最低。寫到這裏，本文已經出現兩個成本了。一個是這類課程必修給我們帶來的制度成本，現在要談的是消融這種制度成本的改革成本。這兩節想說的是，上述制度成本很高，但是消融上述制度成本的改革成本，比較來說卻很低。

以上斷言容易達成共識，是出於筆者對於內地高等教育現狀的深切了解。事實上，只要允許高等學校師生自由發表意見，例如通過無記名問卷調查來了解真實情況，相信他們都會以壓倒性的多數，擁護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所有專業必修課的系列。能否自由發表意見，不是一個告白、聲明甚至「承諾」就可以做到的，所以陳寅恪當年要求「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sup>⑧</sup>。能否自由發表意見，需要一定的制度保證，雖然這種制度保證本來很容易做到，具體操作也非常簡單，但問題是主管部門是否允許這樣做。

清華大學張緒山教授的文章〈「錢學森之問」：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談到錢老「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後親眼目睹了民國時期成長起來的具有強烈獨立意志的知識份子群體從失語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鸚鵡學舌式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成過程」，以錢老的聰穎過人，「他不可能不明白，對傑出人物的致命戕害來自何方」<sup>⑨</sup>。這是相當深刻的觀察。

一種學說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或者「戰無不勝」、是否一定要拿來作為所有人的「指導思想」，連同一個組織是否「偉大光榮正確」，應該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武斷地說某種學說「放諸四海而皆準」或者「戰無不勝」、並且要拿來作為所有人的「指導思想」，一定要說某個組織「偉大光榮正確」，都不應該是大學課程的內容。例如，為了自圓其說，學生被告知列寧怎樣突破馬克思的預言，毛澤東又怎樣突破列寧的模式。其實，如果兩位後人真的比兩位先人更加偉大，不也正好說明沒有甚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嗎？

更不必說，標榜與時俱進的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都不免要反映當時領導人的意志，受「當局進退之影響」，表現「朝令夕改」，無益於「大學百年樹人」。這也正是馮友蘭先生這些大師們預見到了的。六十年來，前面一段的表現形式，主要是「上面」的政策變一變，「下面」的課本趕緊改；後來一段則是這個理論要進大學、那個學說要進課堂、又甚麼觀要進課本，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愈來愈膨脹，叫大學吃不消。萬千學子青春年華非常寶貴的時光和精力，就這樣被無謂地消耗得愈來愈多。這些課程，實際上以扼殺創新性為己任。

## 六 改革成本最低

倘藉錢學森「世紀之問」和溫總理的教育改革座談會，教育改革果真能深入開展起來，那麼從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系列開始，它的實

倘藉錢學森「世紀之問」和溫總理的教育改革座談會，教育改革果真能深入開展起來，那麼從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系列開始，它的實施成本最小，釋放的空間最大，並且以擁護還是反對的人數計，反對的人數極少。

施成本最小，釋放的空間最大，並且以擁護還是反對的人數計，反對的人數極少。

先說阻力。可以預計，絕大多數大學老師和幾乎所有大學生，都會擁護這類課程退出大學所有專業必修課的系列。大學生都為這類課程空耗他們那麼多時間和精力而苦惱。即使極少數劍走偏鋒當初因為其他課程比不上同學而在高考時選考政治的同學，進了大學以後，也不願意把寶貴時光再花在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上面。現在我們內地大學的課程表，比國外和境外的大學擁擠得多。如果能夠因為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的退出而變得寬鬆一些，教學生態好一些，自由思考的時間多一些，則學子幸甚，大學幸甚，我們中國幸甚。

教員方面，首先可以斷言，幾乎所有不擔任這類課程教學任務的老師，都會擁護這些課程退出必修課系列。其次，擔任這類課程教學任務的老師，許多本來就已經為自己的「學科」感到尷尬。前述馮友蘭先生執筆的西南聯大答覆民國教育部的信裏面寫道：「今教授所授之課程，必經教部之指定，其課程之內容亦須經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為教育部之一科員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學生尤敢輕視教授之念。」<sup>⑩</sup>這個描述，對於當今擔任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教學任務的老師，尤其準確，他們實在「不能自展其才」，更不必說面對學生的「輕視」了。如果有合適的和體面的途徑讓他們離開，他們恐怕會求之不得，至少不會太抗拒。另外，這些教師的口才一般都比較好，行政適應性也相對強一些，從事其他一些有益工作，未必不是一種解脫。

最大的阻力，只來自本身不在教育領域的最上層極少數官員，特別是最上層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所以只能說以擁護還是反對的人數計，反對的人數極少，不敢說反對的力量小。相反，反對的力量可能極大，因為我們的體制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而黨又領導一切的體制。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如果這些官員能夠以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為重，順應民意和潮流，不憚改弦更張，與廣大師生和全國人民一起，率先在中國高等教育的這個突破口完成一場光榮變革，那麼，共和國的歷史上一定會記載他們這重彩的一筆。

一次又一次，人們總是要引經據典，辯論清楚經典作家和偉大領袖是怎麼說的，才可以做一點事情。更有甚者，人們總是要辯論清楚經典作家和偉大領袖的一句話是甚麼意思，才可以做一點事情。這不是很可悲嗎？

## 七 小平為我們鬆綁

對於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發展，意識形態方面的禁錮，一直危害很大。一次又一次，人們總是要引經據典，辯論清楚經典作家和偉大領袖是怎麼說的，才可以做一點事情。更有甚者，是一次又一次，人們總是要辯論清楚經典作家和偉大領袖的一句話是甚麼意思，才可以做一點事情。這不是很可悲嗎？固然談何容易，最後還是「下級服從上級」，誰的官大誰說了算。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最高方面一再以中央編譯局的名義，宣布以前對於經典作家的某一論述翻譯錯了。被文革挑起的兩派，都拿「最高指示」攻擊對方，似乎都可以將對方置之死地。這些，都是意識形態問題被不恰當地放在至高無上位置的具體表現和惡果，給我們的事業帶來很大危害。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提出著名的「不爭論」，讓我們雖然跌跌撞撞，畢竟能夠走到現在這樣一個狀況。其實，鄧之所以提出「不爭論」，何嘗不也說明，如果要展開意識形態「認證」，他也未必是一些意識形態專家的對手？好在他因為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善於運用他至高無上的權威。

當前的一個進步，是至少在字面上，大家都同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學術的根本，也是成就大師的前提。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只是呼喚「大師」，卻仍然沒有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供制度保障，那麼這些呼喚只是徒然的空喚而已。我們一定要建立保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育環境和法律環境，而讓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必修課系列，實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其實，鄧小平已經給我們鬆綁，因為他在改革開放之初就特意給我們提出：「實事求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凡是實事求是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這不就解放了嗎？

筆者是從事經濟學教育的，知道過去的經濟學教育，總是把「商品和資源的價格由凝結在商品和資源當中的社會必要勞動價值量一元地決定」，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按照這種理論，尚未開採的煤炭石油和尚未砍伐的原始森林，就都沒有價值了，這也正是我們的經濟發展一直是資源消耗型的增長的意識形態根源。很明顯，這種理論不是科學的理論，在現實中更是遺害廣泛。

經濟學理論方面，在大家尊稱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時候，他還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說，他沒有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這更是提供了「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樣板，提供了以身作則的樣板。這個「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至少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都可以做到。

溫總理談到大學不要「千篇一律、千校一面」。筆者建議大家考慮從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所有專業必修課的系列做起。只要願意去做，允許去做，相信它比教育改革的其它所有設想都更加容易做好。雖然我們無法預言具體的進程，但是可以相信，這類課程退出大學所有專業的必修課系列，遲早會發生。退出愈早，我們的教育也就受益愈早，我們的國家也將愈早受益。

溫總理談到大學不要「千篇一律、千校一面」。筆者建議大家考慮從主義思想理論類課程退出大學所有專業必修課的系列做起。只要願意去做，允許去做，相信它比教育改革的其它所有設想都更加容易做好。

### 註釋

- ①③ 參見<http://edu.sina.com.cn/l/2009-08-24/1658176418.shtml>。
- ② 參見[www.edu.cn/zong\\_he\\_news\\_465/20100209/t20100209\\_448834.shtml](http://www.edu.cn/zong_he_news_465/20100209/t20100209_448834.shtml)。
- ④⑩ 參見<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2340>。
- ⑤ 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9-11/05/content\\_12388294.htm](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09-11/05/content_12388294.htm)。
- ⑥⑧ 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20年》（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102。
- ⑦ 轉引自<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9239188.html>。
- ⑨ 張緒山：〈「錢學森之問」：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炎黃春秋》，2010年第6期，頁70。